

文白

对照全译

资治通鉴

(第三版)

改革出版社

ONG JIAN 张宏儒 沈志华 主编

文 白 对 照 全 译

资 治 通 鉴

(第 三 版)

主 编 沈志华 张宏儒
副主编 马 怡 李丹慧
陈东林

第一册 第 一 卷 至 第 五 十 七 卷
周威烈王至汉灵帝(前 403—公元 180 年)

改 革 出 版 社

1998 年 3 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沈志华主编·—3版·—北

京:改革出版社,1995.9

ISBN7—80072—712—2

I.文… II.沈… III.编年体—资治通鉴—译文 IV.K20

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3822号

责任编辑 李太友

杜 豪

郑保华

封面设计 武宝玲

监督印制 郝平生 刘志豪

改革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23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三二〇九工厂

北京龙华印刷厂印刷

北京机工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8月第三版 1998年3月第三次印刷

787×1092 1/16 402印张 9960千字

印数:20001~30000册

定价:430.00元

做好经典古籍
今译工作

陈云同志



陈云同志历来重视我国古籍的整理和普及工作，了解到本书的编、译情况后，欣然为本书题词：做好经典古籍的今译工作

华夏文化史研究所并

《资治通鉴》今译本编委同志：

古籍今译，是继承祖国宝贵文化遗产、教育子孙后代的一项重要工作。你们组织一批中、青年科研人员，发扬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辛劳工作的精神，在很短时间内，完成我国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的今译并付诸出版，值得赞扬。望继续不懈努力，对整理古籍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A large, expressive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李先念' (Li Xian'ian).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抓紧做好古籍整理工作

薄一波

我祝贺我国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今译本的出版。

中国有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仅保留下来的古籍,据说就有十几万种。这是一笔非常之珍贵的精神财富,它不比我们地上地下的物质财富逊色。陈云同志早在十年前就指出,整理古籍是关系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要搞上一百年。他还说,让更多的人看得懂,要有今译,即把古文译为今文。李一氓同志在世时,曾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人们常说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要挺然屹立在世界上,并且为人类多做贡献。从长远看,或者说根本之点,就是要大大提高我们民族的素质。素质的内涵很广,有体力、智力方面的,还有文化、科技、管理、政治、思想、理论方面的。我觉得首要的一项工作,是要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一个没有教养的民族,前途不会很光明。在这里,就不能忽视祖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教育。民族的优秀传统,如同我们党经过多年艰苦奋斗形成的优良传统一样,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我们只有不断增强这种力量的义务,绝对没有削弱这种力量的权利。不懂得这一点,就要犯大错误,为历史所不容。

整理古籍,除搞好规划外,第一步就是作好今译工作,要译得准确生动,便于人们尤其是青年人阅读和领会;然后是组织研究,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再进一步是实行以史为鉴,与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注重从历史中学习,古为今用,鉴往开来,也是我们民族和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名言,叫做“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他本人就很会总结历史经验,所以他能开创唐初的“贞观之治”。杜牧在他的警世之作《阿房宫赋》中写道:“秦人不

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意思是说，不了解不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们必将重蹈历史复辙。毛泽东同志更是善于从历史中学习的博古通今的大政治家，他曾经将《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倡导全党学习，他在给郭沫若同志的信中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又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我以为现在的整理古籍，也是大有益于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的，“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希望全国上下把这个工作当成一项系统工程，真正抓紧抓好。

有同志告诉我，华夏文化促进会华夏文化史研究所这次组织今译《资治通鉴》，是白手起家，没有要国家一分钱，他们组织了几十位有志于古籍今译和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同志，不辞辛劳，昼夜赶工，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的翻译、审校任务。他们做了一件开拓性的工作，也为中青年科研工作者树立了榜样。这种好作风是值得赞扬的，所以我要为之祝贺，并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此文为薄一波同志在《资治通鉴》刊刻出版九百周年暨《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出版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修订本)编委会

主 编 张宏儒 沈志华

副主编 马 怡 李丹慧 陈东林

编 委 (按姓氏笔划)

马 怡	毛双民	王景桐	孙家洲	关燕于	李丹慧
李红旗	李解民	刘新风	陈东林	陈奇志	沈志华
张宏儒	胡友鸣	柳 宪	袁 熹		

译稿人 (按姓氏笔划)

马 怡	王 齐	王景桐	毛双民	白 隅	石旭红
孙家洲	李 岩	李丹慧	李国荣	李国新	李解民
李裕群	吕 艺	任 可	刘 驰	刘宁勋	刘洪波
刘新风	齐克琛	齐勇锋	陈东林	陈绍棣	陈柯云
宋培学	杨 璐	张书才	柳 宪	侯 明	郭风岚
胡友鸣	赵长才	骈宇騫	袁 刚	袁 熹	党圣元
徐怀宝	浦志强	翁杰明	高路明	董洪利	谢桂华
曾镇南	薛有红				

修 订 人 (按姓氏笔划)

马 怡	李丹慧	李斌成	吴树平	陈东林	陈铁民
沈玉成	沈志华	张泽咸	张政烺	曹道衡	

绘 图 郭利民

初 版 前 言

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编年类》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仁宗宝元初年中进士甲科。后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为龙图阁直学士，曾于治平年间进《通志》八卷，记战国至秦二世之史事，得英宗赏识，受命再编《历代君臣事迹》。遂设局于崇文院，选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为同修官，始协力倾心于编纂。神宗即位，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时司马光以反王安石变法故，坚辞枢密副使之职，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随后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十五载，六任冗官，书局自随，沉精积思于《通鉴》之编写，不舍昼夜，终至元丰七年（1084年）告竣，呈帝御览，因迁资政殿学士。次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司马光应召入京，走马还朝，于元祐元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尽废新法，叱咤于“元祐更化”之时。但为相八月，一病辞世。

观前人之所为作，可谓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修《春秋》；屈原放逐，始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司马迁腐刑，乃显《史记》。司马光虽未如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縲绁，亦以泥守旧制而离朝廷，投闲置散，由居庙堂之高，转处江湖之远，仕途困厄，政治失意，方专注于治史，得以蔚然成就《通鉴》。

司马光之著《通鉴》，其一在于“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乃“删削冗长，举撮机要”，纂一部编年通史^①；其二则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②，“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③。乃“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④，成一部政治通史。故司马光以其记历代治乱兴亡之迹，供皇帝阅读，助人主辨所谓是非之志，虽违离阙庭，区区之心却念于政事，朝夕寤寐，常居帝王左右。乃至消得“骸骨癯瘠，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⑤，十九载之精力，尽于此书。如是终成大手，史坛虎步，光辉蔽体，不输马书班赋。

《资治通鉴》以其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终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录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成书二百九十四卷，另《考异》三十卷，《目录》三十

①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进〈资治通鉴〉表》。

② 同上。

③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谢赐〈资治通鉴〉序表》

④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进〈资治通鉴〉表》

⑤ 同上。

卷,总三百五十四卷,三百余万字。其于采正史之外,又用稗官野史、奏议、笔记、文集、谱录、墓志、碑传、行状,杂史诸书凡三百余种。于盈积简牍浩如烟海之中,抉摭幽隐,校计毫厘;罄竭所有,贤君昏主、忠臣奸佞、勇将懦夫、志士小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①,堪称巨制。是故成书九百余年,始终为世人赞扬推崇,与司马迁《史记》并为华夏文化遗产之双璧,海内外蜚声扬名。

《通鉴》乃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之最大者,其立编年体通史之规模,年经事纬,“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②,虽不惮征引史料,却并无骈拇枝指、附赘悬疣之繁,所谓登高望之,旗整辙清。且其袭于《春秋》,而慷慨论列长于《春秋》;承于《左传》,而记事记言浑然一体优于《左传》。如是前导清源,后振芳尘,高步有宋以来。

《通鉴》略古详今,着眼于为政得失之道,虽密于政事不免疏于其他,但其择收我国古代政治史料,剪裁运化,系而统之,独为一部政治通史,警戒后世,其传之于今,仍堪镜考。

《通鉴》记人则神采飞扬,呼之欲出;叙事则词章纵横,河漫伏流;抒发情怀即大言小言,清风穆如,长声慷慨,短音辛婉;渲染战争即恢廓场面,奋其意气,推波助澜,一泻汪洋。其文辞简洁洗炼,华采虽少于齐梁,宏壮却可追两汉。读诵诸篇,或如鼓琴奏曲,势若江河,或如清风凉日,月明星稀,每使人畅快淋漓,欲扬眉抵几,呼天喝地。可谓鹰扬文苑。

世之研究司马光《资治通鉴》者众多,各类释文之中,尤以南宋史学家胡三省耗时三十年之久所作之《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为著。其将注释及司马光《通鉴考异》融入《通鉴》原文之下,成为今日流传之本。而观《通鉴》之刊刻出版,其于北宋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奉旨下杭州镂板,元祐七年刻竣。时隔数载,以哲宗亲政时及徽宗崇宁年间恢复新法故,司马光身后一度罹“追贬”等厄运,《通鉴》书板亦险遭毁坏。此后,《通鉴》以本书、目录、考异、点校、注释、详节、要览、选本等诸多名目刊刻出版,绵绵不绝。计南宋以来,有监本、余姚官刻本等二十余种;终元一朝,又见张氏晦明轩刻本、兴文署本凡十种;明起弘治元年以下,成槧十余种,每二十余年即刊刻一次;有清一朝,乃承飞雪堂刻本、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等九种;民国初创,即有涵芬楼铅印本、《百衲本宋本资治通鉴》等七种;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6 年以来,始有北京古籍出版社之精装点校本、中华书局之平装点校本等数种。中华版本以清胡克家刻本及近代章钰所撰之《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为底本,汲取前人之考订成果,谨于校勘,当为今世之佳本。

漫漫九百余年,《通鉴》之刊刻出版七十余次,实为我国历代各类史书刊刻出版所罕见,足证其影响之深远。正所谓斯人,斯书,生享盛名隆誉,死亦传青镂之管。

二

“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宋史新编》

一代伟人毛泽东,几伴其一生之书,即《资治通鉴》。其读之入迷,穷一十七遍,至书页残破,仍爱

① 王磐:《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

② 宋神宗:《《资治通鉴》序》。

不释卷，且言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遂屡屡向各级领导干部推荐，又教读于左右，循循导启，臧否人物，捭阖事端，详批细引，不厌其烦。

毛泽东之读《通鉴》，释其起于三家分晋，寓意在“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可谓开宗明义，鉴以在上者不正，在下者肆意，事所必至，理有固然；论其迄于五代，用心在避曲笔言事，粉饰当朝，所谓“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倡以立论疑古，读书不可尽信，不可囿于人言；评其战争史笔，泼洒打天下、守天下之迹，乃政治之继续，要在取舍治乱得失，上助君王之鉴；议其褒贬明主昏君，赞前者之治国之道、用人之术，警后者之庸聩乏能，误国误民。凡此种种，述论尤多。究见其熟读《通鉴》，旨在以史为镜，借鉴前人得失，用古为今。

一部《资治通鉴》，既以其内容、思想之博大精深，录事之求实考信，通古今之变，兼收并蓄，拾遗补阙，而成为学史、研史者不可不兼读之书；又以其考评前世之兴衰得失，镜鉴于后人，有资于治道，而成为领导国家者不可不读之书，普通人众不可不读之书。惟其举要若此，方为天地间不可阙如之书。毛泽东曾言，历史不可割断。从孔夫子至孙中山，当总结之，以承继此份珍贵遗产，其对于指导今世，帮助匪浅。《通鉴》即在此珍贵遗产之列。

但《通鉴》成书时近千年，其文字毕竟古朴，又兼记载弥繁，以至古人读之，尚感入海算沙，穷年不能究其辞，没世不能通其义，常发如山之峨，如海之茫之叹，更何况今人碍于其言辞之涩、学识之博，阻于其名物之繁、制度之多，势必困于读通，窘于理解，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另如司马光亦自言：“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①是以学者尚不易卒读，遑论一般之人！足见《通鉴》之今译工作实已刻不容缓。

大凡本固则末茂，源浚则流清。以今日通行之白话文全译《资治通鉴》，使此煌煌巨作，人人能得而读之，为各阶各层提供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之机，当可助人辨兴亡之事，明安邦之道，树为人之本，立报国之节，知其利害，晓其善恶，追览既往，奋扬开来，对我华夏博大精深之文化遗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民族精神，多一分思索。

司马光纂《通鉴》，以儒家正统思想提纲挈领，势所必然。其“臣光曰”类史论总约二百余处，精华糟粕杂于其间。《通鉴》之今译并非高山仰止，其正可助人于读通读懂之中，条分缕析，批判继承，弃其糟粕，扬其精华，推陈出新，对我华夏千年之优秀传统文化，万年之文明古国，增一分爱心。

纵观《通鉴》今译事，应可谓携人登高山，泛巨海，促末茂流清。其意义既深且远。

三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荀子《劝学篇》

人不可无志，所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故我研究所创立伊始，同道学子有感于世风之流俗，学势之式微，著书立言之苦，阐幽发微之难，滋滋以探求治学新途，终日冥冥、惛惛于此道，欲登高山，临深溪，至千里，绝江河。此可谓志其一。

岁月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即至，况须臾间魂气飘去，身后空空，将何颜以见先人？所中诸君同心

^①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戮力，勤勤兢兢于此业，不求功著于景钟，绩垂于丝帛，但望抚心而无愧。此可谓志其二。

基于此志，我们常思以根之于历史者深，胎之于风俗者固，因之于地理者远，必生出一种凝不可懈之精神，此即华夏千年之文明，扬扬洒洒传统文化之集萃。何以扬其精，摒其糟，穷究华夏文化之博史，弘发华夏文化之灵秀，正当为我们实践志向，奋发而求有所作为之一题。如是乃检索史籍，首选出司马光《资治通鉴》，以白话译之，力图通今古，传经典文章于大众，成就登山泛海，促末茂流清之果。

但以《资治通鉴》之篇鸿制巨，今译实非几人精力所能为功。故此我们苛定底本，严择译家，会聚十几家学术机构之数十位研究人员、专家学者，集思广益，推敲攻研，翻译编审，竭力尽心，倾拳拳之忱，奋勤勤之劳，步步不离此全译《通鉴》事。乃至无轻绠以被身，无百味以厌口，无华靡以极目，无丝竹以倦耳，挑烛灯守长夜，在所不辞，终奉出此全译之本。

此本其文义以忠实于原著为要，含英咀华，于直译之中，求准确、精炼；其文字取通俗流畅之势，感灵觉异，于求雅之间，留原作用语个性。又附原文以利对照，提供细品古文韵味之便。

全译《通鉴》，泱泱大事，以数十人之力，既苦之于初做，又限之于水平，其疏漏、舛误必多。故我们殷殷期望于专家学子、大众读者不吝赐教，以资再作修订，获取更精之译作。所谓“骐驎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悠悠华夏历史，结晶文化遗产，多如高原决水、汗牛充栋，其整理、普及迫在眉睫。我们愿效愚痴之力于此项宏伟事业，以聚纤尘而成就泰山之巍峨，汇细流而成就江海之深远！

华夏文化史研究所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编委会

1991年8月

修订本出版说明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许多读者来信予以鼓励,并对书中的体例及翻译文字等提出了宝贵意见。根据读者意见及书面调查结果,我们在原书基础上,经过修订改进,决定出版修订本。在修订本中,我们主要作了以下几方面改进。

(一)约请对中国古代史及古代汉语有较深研究造诣的专家、学者,对全部译文逐字逐句进行修订,改正了原书译文中的一些错舛之处,使之更加准确、精炼、流畅。

(二)应广大读者要求,将原书的原文、译文分朝代对照排列,改为每面双栏分段对照排列,便于读者随时对照原文。

(三)将原书的字体由小5号字,增大为5号字,全书亦由三册增为五册。

(四)对书后所附“职官名词解释”作了补充,增加了书中一些常见职官名词。

修订本遵循的凡例如下:

一、关于原文:

1. 原文参照中华书局1987年4月第7次印刷标点本排印。其中由译者改正了该本的标点错舛、排误字约三百余处,不再另行注出。标点本中的小号字夹注(包括胡三省注、章钰校语等),因译文中已酌作吸收参考,故原文中均不再收录。

2. 标点本的标点整理者对原著的错舛、缺漏、衍文等,用[]、()、〈 〉等符号做了整理,本书在排印原文时,直接予以引用,不再注出。对标点本中以□□标出的难以辨识字、残字,译文中虽参照有关史料补充译出,但原文排印仍沿其旧,希读者对照时予以注意。

3. 司马光原著系采自多方史料,故人名、地名等多有不统一之处,如“高句丽”又多处作“高句骊”;“临淄”又作“临菑”。原文仍沿其旧。

二、关于译文:

1. 使用现代汉语书面语言,力求准确、精炼、流畅。一般为每句对应直译,对于个别直译难以读懂之处,允许调换语序、增加适当文字。对较为抽象的原文论说,适当采取意译办法。

2. 人名、地名、官职名、度量衡单位一般不作翻译。但古今地名易引生歧解者,酌情予以翻译,如“山东”,译为“崤山以东”。

3. 典故、专用词语中,凡现代汉语中仍在广泛使用的典故成语、词汇,如“负荆请罪”等,不译。古代礼制、经济等专用词,如“食邑”、“假黄钺”等,在较早出现之处酌作解

释,其后相邻之处则沿用。

4. 帝王的称谓,一般使用庙号,但少量追谥或废帝等则使用本名。尽量遵循司马光修书中所奉正朔,以某“纪”内该朝君主称“帝”,并存的其他政权则视情称为“国主”、“王”等。但司马光原著中此类称呼亦见混乱,常有“帝”、“王”、“国主”等交替加于一人之身,尤以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为甚,译时为读者对照方便,则不强求全部统一。

5. 时间的译法,于卷首标题帝王纪年后以括号注出公历年,译文内干支记日后以括号注出旧历日期。由于原书系司马光等人采摭多种史料摘编而成,故干支记日常于月份不符,有些虽可证诸二十四史等予以勘误,但为保留原貌便与原文对照,译文中均不作考辨与调换顺序,仅于其后括号内以“疑误”注出。

6. 为方便广大读者,原文、译文均用简化字排印。但人名、地名等简化后易引出异义的,则不予简化,仍用原字。异体字采用常用字,通假字一般不予统一。

7. 诗歌、民谣、经典引文均予译出,尽量保留原文韵味。但某些引文在该处有特定引申意义者,允许结合上下文酌作适应性翻译。

8. 对标点本的整理校勘字,译文中径作改正,不再标出符号。但对原著的史实性错误,为保留原貌,不作改正。

9. 本书所附历史地图、帝王世系表、职官名词解释,系参照中国通史编制,并非《资治通鉴》专用,于此仅供参考。

10. 对原文中个别语句有不同解释,经译者、修订者商榷后未能统一者,一般尊重译者意见。

《资治通鉴》为司马光集众手诸书而成,横贯一千三百余年,卷帙浩繁;译本亦为多人分工合作之成果,仁智互见,故本书虽经修订,错舛之处定仍有不少,尚祈诸方家不吝教正。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编委会
改革出版社

1993年2月

第三版出版说明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初版与修订本的印数已一增再增,业已销售一空,于是需要再次重印。这样的印数,在古籍整理图书中,虽不敢说是空前的,也称得上为罕见。它反映了中国人重视自己历史的优良传统不但还在继续,而且通过语体文的翻译已逐步深入到广大群众之中。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虽经兴衰沧桑,迄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固有种种原因,而善于以历史为镜鉴,是有重大关系的;今能深入群众各阶层,则社会进步,国运昌盛,不待龟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提倡“做好经典古籍的今译工作”,诚为远见卓识,为古籍整理中贯彻“古为今用”之南针。这是一。其次,庞大的印数,即是对我们以往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我们的鼓励与鞭策。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精确完善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决不可能一蹴即就。何况《资治通鉴》是一部巨篇宏著,即使专治历史的人,对其内容全部理解已属不易,更欲以语体文表达,而达到正确精练,其难度可想而知。为弥缝其阙,精益求精,今乘第三版之机,编委会并出版社又组织了一批专家,会同原译校者,重作检查,再次订误,以期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更前进一步,答谢读者对我们的鼓励。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1. 对照原文检查译文,使译文更加准确、简练;2. 检查译文,使译文更加规范;3. 对编校中存在的问题予以改正,等等。

中国古籍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过程中应予批判继承的重要内容。事实证明,古籍今译很有必要,其功在当代,惠及子孙。同时,对古籍今译也应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积极着手工作,不以古籍中存在少数疑难点而因噎废食,止步不前,而是在翻译出版中不断研究探索;出现具体问题认真对待,邀集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处理;对已出版的书中发现的错误,立即修订改正。这是我们已经采取并将继续坚持的态度。

我们真诚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教,共同将古籍今译工作推向前进。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编委会
改革出版社

1995年9月

宋神宗《资治通鉴》序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者也。

汉司马迁绌石室金匱之书，据左氏《国语》，推《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摭传，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至于麟止，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

若稽古英宗，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迄于五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牒之渊林矣。

朕知道，君子多熟悉前人之行、往昔之事，以此来蓄养品德，所以能够刚健坚实，光辉日新。《尚书》也说：“作为君王，应该广采众学，时刻有所建树。”《诗经》、《尚书》、《春秋》，都是说明得失的规律，存守王道的正统，给后代以借鉴和训诫的著作。

汉代司马迁缀集皇家石室和金柜里的典籍，根据左氏《国语》，推究《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博采经籍，摭取传纪，网罗天下轶事旧闻，进行考证，纵横驰骋于上下数千年间，开篇记载黄帝轩辕氏，至于西汉发现麒麟而止，创作纪、表、世家、书、传形式，使后世述史者都不能改变这种体例。由于他判断是非不与圣人相悖，褒贬十分得当，才被称为优秀史家的人才。

父皇英宗，留神典籍，日理万机之时，也未尝辍止读书。曾命令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列历代君王大臣的事迹，让他在皇家秘阁翻阅文献档册，供给史官、笔纸，修撰起自周威烈王、迄于五代的历史。司马光的意见认为：周朝积弱，王室衰微，礼乐仪制和军事征讨都由诸侯恣意自为；周平王被迫东迁国都，齐国、楚国、秦国、晋国于是强大；齐桓公、晋文公交替称霸，仍假托尊崇周王为辞以收服天下。直至周威烈王任命臣子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时，周朝虽尚未灭亡，但王制却已完全毁掉了！这也是古人著书时开篇立意的原由。书中记载圣明君主、贤良大臣，切磋治国之道，议论中的精辟语句，道德、刑法双管齐下的良善制度，上天与人世之间的关系，吉凶、善恶现象的根源，权力福祿兴盛衰弱的原因，规划利害的效果，优秀将领的战略，廉谨官员的治策，以邪正为标准进行判断，从郅治与怠忽中抓住要旨，直至词语渊博厚实的文体，哲理深刻的含义，实可称完备无缺。全书共记载十六个朝代，辑成二百九十四卷，放置于室中而尽知古今之道统，内容广博而得其要点，简明而又周详于事件，也可称为历代典制法规的总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灿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余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

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

汇，档册文牍的全书。

荀况曾说过：“若想观察圣人的形迹，便要寻其出类拔萃者，后代贤王即为其例。”像汉朝的文帝、宣帝，唐朝的太宗，正属孔子所说“我无可非议”者。其余太平治世享有盛名的君王，或有忧国忧民仁爱之心，或有忠贞利民的教诲，或知人善任，勤俭谨慎，也各得到圣贤的一方面，如孟轲所说“我对于《武成》只取其二三事而已”。至于荒淫覆亡者，可使我们见到前车之鉴；乱臣贼子，则引起我们严寒将至的警惕。《诗经》说：“商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夏朝的灭亡。”所以赐此书名为《资治通鉴》，以表明朕之心志。

治平四年十月初次开设御前讲经，奉圣旨讲读《资治通鉴》。

是月九日，臣司马光开始进读，皇帝面赐御制序，命臣待书成之日写入。